

河南史志資料叢編之三

河南辛亥革命史事長編

上卷



责任编辑：蔡春玲

河南史志资料丛编之三

河南辛亥革命史事长编

(上卷)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王天笑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濮阳豫行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297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 11105 134 定价 2.60元

目 录 (上卷)

河南辛亥革命概述——代前言	1
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河南的社会经济状况	39
(一)帝国主义的侵略	39
1. 英国福公司劫夺豫北煤矿	39
2. 外国资本修筑道清铁路和汴洛铁路	58
3. 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	71
4. 宗教侵略	75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衰退	86
1. 商品市场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86
2. 农业生产的衰退	89
(三)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的创办	94
1. 矿业	95
2. 纺织业	103
3. 面粉、造纸、榨油业	111
4. 火柴、水电等业	117
5. 瓷器、蛋品、运输等业	119
6. 民族资本主义成长过程中的困难	119
4. 商会	125
二、“新政”的推行和封建剥削的加重	134
(一)“新政”的推行	134
1. 练兵和办巡警	134

2. “振兴实业”	144
(二) 人民负担的剧增	154
1. 地丁和差徭	154
2. 诸种杂税	158
3. 人民生活的贫困化	181
(三) 政治的腐败与黑暗	185
三. 近代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和资产阶级	
民主思潮的传播	192
(一) 兴办学堂	192
1. 兴学过程	192
2. 存在的问题	229
(二) 出国留学和创办报刊	236
1. 选送留学生	236
2. 创办报刊, 传播新思潮	248
(三) 资产阶级小资业阶级知识分子的涌现	261
四. 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展	265
(一) 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端	265
1. 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	265
2. 省内志士的革命活动	278
(二) 革命派思想言论一斑	283
1. 《〈河南〉发刊之旨趣》	283
2. 《平民的国家》	287
3. 《对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	290
(三) 迎接革命高潮的准备	301
1. 革命活动的开展	301
2. 武装起义的准备和尝试	315
3. 河南同盟员名录	324

五. 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332
(一) 农民斗争的广泛发动.....	332
(二) 秘密会社的发展和斗争.....	364
(三) 城镇人民的斗争.....	388

河南辛亥革命概述

——代前言

发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10月10日武昌起义为契机，短短的三四个月内，全国各族人民就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近代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地处清朝反动统治的心脏地带的河南，因为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上，反动势力占居压倒的优势，所以未能象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那样脱离清朝统治而“独立”。但是，不论在革命的准备阶段或爆发阶段，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河南人民都没有后退，他们怀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豪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仆后继地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一线，为使我们可爱的祖国和伟大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反动统治，求取民主、自由、独立和富强，舍生取义，英勇献身，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丰功伟绩。

作为本时期河南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者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在本世纪初涌现和逐步成长起来的。这是与同一时期内河南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的传播分不开的。

河南作为一个远离通商口岸的内陆省份，在中日甲午战争

以前，还没有成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直接对象，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其侵略魔掌也进而伸入河南。在英国的福公司攫取了豫北煤矿之后，帝国主义又夺取了京汉、道清和汴洛等条铁路的修筑权，分别于1906、1910年修成通车（前此分段通车）。利用这几条重要的通道，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就迅速地延伸于河南广大地区。除了“迭有洋商闯入，开设店号”（见本书第71页）外，汉口等地的买办商人在外国洋行的操纵下前来河南铁路沿线城镇开设洋行、堆栈或各种“华洋公司”。他们凭借帝国主义的特权，“任意开设，买卖土货、洋货，并代客包运货物，承揽车船，人众势强，动辄滋事，欺压商民，垄断罔利，习以为常。”（见本书第72页）经由这些路侵据点和中转站，帝国主义的机制商品就如潮水似地涌入河南，来势十分凶猛。1905年《河南官报》第71期有一篇“论说”在述及河南各地的“现状”时就记称：“洋货山积，土货寥落，除花纱、呢羽、火油、色布大宗不计外，即日用零星如针线、纽扣、铁钉、纸张之属，亦复充牣罗列，无论大小市镇，触目无非外货。”以后铁路通车，“舶来之洋货、各省之仿品”，更如潮水似地泛滥于河南城镇。如1907年上蔡知县就禀报县境情况称：“外来货物，日益灌输，民间向来服用，渐且取资外洋。”（见本书第73页）汝南县境，自京汉路通，“舶来品充满市场。”（见本书第73页）类似记载，常见于当时的文献和地方志书。尤其是与河南人民生计关系最大的洋纱洋布，输入更多。1910年间，“就豫省详细调查，几于无县无之。”（见本书第74页）其数量无精确统计，据1905年官方的出版物说“就周口、道口南北火车捐约计其数，岁出（银）不下数百万。”（见本书第73页）另据1908年安阳广益纱厂

的创办人估计，河南每年输入的洋纱洋布各值银数百万两。（见本书第105页）这样，就使得河南传统的家庭纺织业，传统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此同时，省内的经济作物也迅速发展，大批的农副产品被帝国主义和本国商人源源外运，以适应日益扩大的帝国主义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需要。比如在西平一带，“自铁轨通行，四方辐凑，所出芝麻等物，销路日广。”（见本书第87页）越来越多的农民在放弃了家庭纺织业的同时，又放弃了或减少了粮食等自给性的生产，改种市场所需的经济作物，从事草帽辫等副业，“专做洋商生意。”（见本书第87页）这样，祖辈相传的自然经济便渐趋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水陆交通便利的地区，“民物络绎不绝于途，商贩欢呼相望于路，”（见本书第86页）“商业大有蒸蒸日上之势。”（见本书第86页）所有这一切，都给河南人民的生计带来严重的影响，几乎遍于全省的手纺织业“因洋布畅销，土布大滞，故种棉与制棉者交困。……从前种棉之妇女，渐致无以自给”，（见本书第74页）。历史悠久、为数众多的土煤窑（出煤100斤成本即需制钱100文左右）也因福公司在焦作生产廉价煤炭（每百斤售价80—130文），而遭受沉重打击，“民间开矿者，尽为吞噬，倒闭、破产者日有所闻。”（见本书第459页）彰德、卫辉、怀庆三府不下二十万依靠采煤，卖煤为生的人民因此难以自存。加上义和团运动后越来越重的封建剥削，遂使河南城乡人民“家有盖藏者百不一二，贫不能谋生者累累然相属也。”（见本书第181页）大批大批的农民和拥有熟练技术的手工工人被剥夺了谋生手段，涌入城市寻求生计。这样，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河南，就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给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必需的物质前提。

从有关的文字记载来看，河南第一家近代企业是禹州的三

峰煤矿。它是在禹州知州曹广权的主持下，招集地方绅商，集股5万元，于1902年创办的。开始时仍是土法生产，不过用机器抽水而已。1903年以后，新办的近代企业逐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到1910年，有文字记载的工矿企业总共有23个，资本总额二百数十万元（见本书第94——120页）。虽然十分微弱，但毕竟是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新经济。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的政治力量——民族资产阶级。

与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逐步成长的同时，适应这种新经济、新阶级需要的近代教育文化事业也开始在河南出现和缓慢发展。从1902年河南高等学堂（始创时叫河南大学堂）创办，到191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各类学堂3536所（不包括由私塾改称的简易学塾）。1910年全省在学学生近9万人。在此以前，从各级各类学堂毕业的学生6400多人（见本书第228页表）。全省107个厅、州、县，每一县（厅、州）均有少则一二所、多则十数所学堂。（不包括简易学塾）与此同时，先后有一批官吏、豫籍进士和青年知识分子，或自费、或官费，出国去日本留学。不管各级封建统治者和地方封建势力如何防范和控制，各级学堂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都成了传播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场所和培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温床。特别是在日留学生，接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乃至民族民主革命思潮更易更多，经过几年的熏陶后，大都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

至于近代报刊，虽然创办较晚、较少，但在辛亥革命前，省城开封一地，即有《汇报辑要》、《河南官报》、《河南白话报》、《开封简报》、《与舍学报》、《河南教育官报》、《宪政月报》、《自治官报》、《开封日报》、《中州日报》、等先后问世。另外还曾集资筹办《河南日报》、《郑州日报》，但未能成功。河南在日留学生另又创办了《豫报》、《河南》、

《中国新女界》、《武学杂志》等。外省的许多报刊和介绍“西学”与“时务”的新书，也通过“开明书店”、“大河书社”、“中州图书公司”等，在省内城乡传播。特别是旅日豫籍革命党人办的《河南》杂志，民族民主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持论也很激烈，每期销行近万份，半数以上均销于河南。虽然除留学生办的刊物外，流传于省内的绝少是革命报刊，但其中的大多数在介绍国内外严峻的形势，传播资产阶级新文化，促进民族觉醒和民主启蒙上，都起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

梁启超在论及“兴学育才”的作用和效果时说：“学校中多一少年，即国民中多一立宪党。何也？彼其人苟有爱国心而略知西人富强所由来者，未有不以此为第一义也。”（《饮冰室文集》之五页5）这种说法虽过于绝对化，但大体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汲县人王锡彤在其所作《燕豫萍踪》中就记称：河南“留学日本归来之学生，殆无一不主张革命者。”这些从国内或从国外学堂中毕业出来的知识分子所致力不再是孔孟儒学和八股试帖，他们普遍地不满现状，积极参与改变现状的政治活动。这样，河南也与全国其他省区一样，在本世纪初涌现和成长起新式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其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而成为河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家、活动家和政治指导者（参看本书第278页至第283页诸例），承担起了在河南发动和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时代使命。

但河南毕竟是一个内地省份，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使河南在许多方面都落在其他先进省区的后面。

从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看：本世纪头十年间全省工矿企业的投资总额二百数十万元，还不到当时本省一个县一年的棉花产值（产棉多的年产值达六七百万，少亦二三百万元），可见这种新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是何等微小。再与同

一时期帝国主义在河南的经济侵略势力比较，1907年光福公司在焦作煤矿的投资即近1400万元，相当于1902——1910年河南全部近代工矿业投资总额的六七倍。如果再加上帝国主义其他方面（如铁路）的投资，那河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就更微不足道。在此薄弱的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河南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说还处在襁褓时期，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从新式知识分子的培养来看，河南开办的各级各类学堂总数看起来也不算很少，但其中有不少是州县官吏为了应付“朝廷功令”而开办的，教学内容上真正的“西学”很少，“惟以旧有书院换一学堂招牌，而内容悉仍其旧。”（《河南》第1号《平民的国家》）因此，许多学堂学生人数越来越少。就全省来看，据1910年第360期《河南官报》记述“学堂学生较之科举时代之应小试者，实不及三分之一。”留学教育更远远落在南方许多省份的后边。

从整个文化思想领域来看，本世纪初，南方青年学子“十七八皆攘臂言新学”，“三尺童子，朝入蒙学，暮以驱逐满州归告其父兄。”（钱振铎：《名山文约》卷6《学堂记》）虽然不无夸张，但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相对于北方内地省份确是比较深广的。河南过去曾是理学的故乡，长期以来，程朱理学一直在思想界占居统治地位，二十世纪初兴起和传播的民主主义思潮并没有使之根本改观。1902年一个在河南作官的江苏人对比河南与江浙的不同情况说，河南“真朴之风未散，最是好处”，而江浙则“人人谈新法，乃大可忧虑之事。”1905年洛阳一个旧式知识分子也自夸说：方今全国都热衷于学西学，“惟吾乡尚保洛学不失。”所谓“民习故常，士多墨守”实际情况确是如此。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无论从广度或深度上来说，都明显地不如其他先进省区。

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构成来看，河南的革命党人，一

部分是从留学界产生，另一部分则从省内土生土长。前一部分虽然往往起着政治指导者的作用，但数量很少，革命运动的实际承担者则是后一部分人。在这部分人中间，不少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有的且带进士、举人、秀才、贡生等头衔），他们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而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由于前列诸因素，这些人封建思想文化的积垢很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则十分不足。如在河南革命党人中很有威信，后来被推为同盟会河南支部领导人的刘纯仁，1898年中秀才，1902年中举人，

“涉猎陆王程朱”。后来转向革命，主张民主共和，但并不是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而是从中国的“圣经贤传”，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来理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建立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在他看来，“中国精神文明，远非西洋所能及；西洋胜于我者，只限于物质文明”；“使国步人情日进于上，舍率天下相励以身心之学，其道无由。”（《刘粹轩实录·年谱》）。另一领导人杨源懋，青少年时也“专攻宋儒书”，1904年成进士，1905年后读“西书”，1908年后“倡民权”，虽入同盟会，但与立宪派人士来往非常密切，积极参加国会请愿活动，清朝被推翻后迅即与立宪派融为一体，看来也主要是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满）和爱国主义的立场参加革命的，革命民主派的思想立场则是比较模糊的。

所有上述这一切，都不能不给河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

从有关资料来看，在本世纪初就有一批在河南本乡本土成长起来的革命志士，开始于若干城镇分散地从事革命宣传和

组织工作。如新蔡任字民，“当清季庚子、辛丑后，努力革命”，在学塾中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刘粹轩年谱》）封邱青年知识分子杜潜，读《时务报》后又读《扬州十日》、《嘉定屠城记》，“遂有推翻满清之志”。他1903年入河南高等学堂学习，与同学曾昭文、王天杰等“演说革命”。王天杰等还组织“体育会”的团体，被人指目为“革命党”，清廷得到消息，谕令河南巡抚陈夔龙拿办，王天杰等因被当局开除。原籍直隶，寄籍河南的车钺也有志于革命，1902年在开封与知识青年蒋立、王梅溪、刘积学、朱奋吾等创办了一所半日学堂，“除讲授普通课程外，兼宣传革命思想。”以后，刘积学和青年志士闫子固、王治军、李锦公等进入开封武备学堂，共商方策，议定毕业后进入河南新军，“联合各部队实行革命”。可惜不久即被反动当局发觉，将刘等送往日本。在中牟县内，1903年亦有从京师大学堂转来的张书勋在小学堂师生中“宣传革命意旨”。在他的影响下，地方上渴望得到革命思想营养的有志之士，想法从外地寻购各种革命书刊，“革命思潮日益浓厚”。在陕县，据记载，在1903年间，即有革命志士在县境活动，并联络当地的秘密会社江湖会图谋起事，次年被反动官府发觉而遭镇压（上见本书第278页——282页）。类似事件说明，在海外留学生向河南灌输革命思想之前，省内已经有一批志士在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组织甚至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即使与南方先进省区比较，河南革命运动的发端也不算晚。但是，由于当时河南民主主义思潮的传播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还很小，革命形势和革命派本身都还不很成熟，以故上述这类活动在社会上“曲高寡和”（《河南通志稿·车钺传》），进展不是很快很大。这可以说是河南民主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发端阶段。

1905——1908年，可以说是河南民主革命运动的第二阶段

——宣传组织阶段。前一阶段在省内涌现出来的革命民主派很快被反动当局发现，遭到取缔和镇压，其中的一些人（车钺，杜潜，曾昭文等）于1904、1905年先后前往日本，进一步寻求救国真理和革命理论，随即加入了1905年8月在东京成立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成为河南最早的一批（十余人）同盟会会员。1906年，刘积学等一批原先在开封武备学堂宣传革命的知识青年，被当局送往日本。在孙中山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又有二十多位河南志士加入了同盟会。他们组织了同盟会河南支部，推曾昭文为支部长（后由刘积学继任）。自此以后，河南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算是有了正规的组织，肩负起了发动和领导河南革命运动的重任。

同盟会河南支部成立之初，革命党人考虑到河南的具体情况，把工作重点放在革命宣传上。在《民报》所出的专号《天讨》上，发表了署名“光武”的《河南讨满洲檄》。檄文追述了清朝统治的历史，历举满洲贵族在河南的暴虐统治给河南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清王朝的卖国媚外政策给国家和河南带来的祸害，进而又结合历史经验论证了河南的重要战略地位，阐明了在河南开展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另外，又由刘积学执笔，以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写了一篇申讨清王朝的通俗檄文，呼吁河南的父老兄弟“其各奋起，莫再迟疑”。（见本书第276页）这些革命檄文虽然只从爱国、反清的角度论述了革命的必要性，于同盟会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很少涉及，但却容易为当时河南的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它连同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通过各种途径输入河南，在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正是在阅读了这类革命出版物后走上革命道路的。

河南革命党人充分认识到革命宣传对于启迪人们的民主觉悟、培养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一些豫籍同盟会

员，如朱奇吾，即“日手《民报》数十册，往各下宿屋中国留学生处求售。以故留日学生革命思想突盛。”（见本书第366页）他们还与其他在日的河南留学生一道，集资创办《豫报》“为启导本省文化之宣传机关”。该报共出六期，虽然因其内部成员复杂，因而革命色彩不很鲜明，但在揭露清王朝在河南的黑暗统治和卖国罪行，宣传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07年，同盟会河南支部为了摆脱《豫报》社中立宪派人的掣肘，放手地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乃由尉氏女革命党人刘青霞出资两万元，创办《河南》杂志。该杂志于1907年底创刊，到次年被日本当局强令停刊，总共出刊九期。虽然为时不长，出刊不多，但“鼓吹民族、民权二主义，鸿文伟论，足与《民报》相伯仲”。（见本书第268页）它旗帜鲜明地宣传了民主革命派思想和主张，有理有据地驳斥了君主立宪派和平请愿的谬说，直斥之为“平民之公敌”；直截了当地提出，除了组织革命军，用革命武装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外，别无其他出路。每期均有几千份销入河南，“河南人士革命思想之开发，此杂志之力为多焉”。

在日本的同盟会河南支部积极开展革命宣传的同时，省内的志士也随着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而继续成长，涌现出一批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如桐柏景同昭，读《民报》后即“醉心革命”，立志“倒清满”。巩县王天杰接触了《民报》后，也就“以光复汉族为己任”。考城王梦兰，从别人处得读《民报》，“喜曰：‘有方法，有导师，今后光复故物，惟待吾辈努力耳’。”商水李干公，在开封大河书社（革命党人创办）经常阅读《民报》、《河南》，“遂灌输革命思想”，成了一名积极活动家。（均见本书第278页至第282页）类似事例，都说明同盟会的革命宣传在促进知识分子思想革命化和培育革命力量上所起的

积极作用，他们的努力收到丰硕的成果。这一批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起来以后，就不顾反动官府的残酷镇压，在河南省内实地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

首先也是革命宣传，这是当时省内革命党人最普遍、最经常的革命活动。他们大都以学堂为立足点，互相招聚同志来校任教，或结合课堂教学，或通过作文，或举行演讲会、评议会、周末晚会，或组织学生自治和各种课外活动，或介绍革命书刊，巧妙地、灵活地向青年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普遍收到满意的效果。为此目的，他们还专意创办学堂，如有名的开封中州公学，即是同盟会河南分会领导人刘纯仁等为了培养革命力量而于1907年创办的，以后其学生几乎全部加入了同盟会。

其次是建立革命组织，设置革命机关（联络站）。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在省内建立革命组织的任务也就提到日程上来。继信阳革命青年刘化欧在1905年建立的“自治学会”之后，1906年，刘纯仁等着手在开封各学堂“物色同志，组织学会，谋结团体，为秘密运动。”（见本书第263页）3月12日，成立了“河南学会。”这是省城里的一些革命者自发组织起来的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反映出革命志士们不再满足于宣传工作，进而开展组织工作的要求。就在这个时候，杜潜从日本返回本省筹建同盟会组织，经过与刘纯仁等商议，随即建立起省内的同盟会河南支部，推刘纯仁为支部长，并决定“设立机关”，即中州公学。（注）公学于1907年创建，“名为办学，实即同盟会秘密运动机关，联络海内外同志，通消息、结团体，为日后举事预备。”（见本书第303页）随后，东京的同

注：冯自由和邹鲁均记称：1909年杜潜来开封组织同盟会分会。但《刘粹轩年谱》记为1908年。注该年谱系据刘纯仁1906、1907两年的日记和其他文字材料编写而成，自属可靠。《年谱》中还收有阎子固1908年从日本写给刘纯仁的信，内中有“闻下与扶东在汴均办‘学务’（党务）之件，已各悉内容”云云，亦足证杜早在1908年前即曾来汴与刘共办“学务”。

盟会河南支部又派李锦公等来汴，在书店开设大河书社。一方面秘密发售革命书报，另方面则借以联络同志，“中外同盟会员，咸以该社为集议机关。”（《革命人物志》册2页469）只是由于整个同盟会组织本身就十分松懈，河南省内的同盟会员又十分分散，支部长刘纯仁不久复因受反动当局的迫害而转往豫西，所以，同盟会河南支部并没有把全省的同盟会员组织和领导起来。但是上述组织和机构的建立，毕竟是省内的革命运动发展提高的重要征候，大大地加强了省内外、国内外革命党人的联系，反过来又促进革命运动的开展。

复次是开展实际的革命斗争。一般地说，在这几年间，河南革命党人还处于扩大组织和积聚力量阶段，象南方革命党人那样采取实际革命行动的条件（不论主观条件或客观条件）都还不大成熟，即还未从所谓“言论时期”转入“实行时期”。尽管如此，一些革命党人在本阶段还是在省内开展了包括暗杀和武装起义在内的革命活动。本来，暗杀作为一种革命手段是不足为训的，但在当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却有不少的鼓吹者和实行者。同盟会东京总部即有一个专门从事暗杀的组织，嗣后在南北许多城市的革命党人中间也涌现出许多热心暗杀的志士，接二连三地开展了一些暗杀活动。在这种思想潮流的影响下，河南的一些革命党人也不甘寂寞。《云南杂志》第7号、第10号《大事月表》和《大事编纪》连续于1907年4月、8月报导河南当局在交通枢纽郑州，拿获革命党员李长胜、李占奎、张书元等多名，他们公开供认“抱民主立宪主义”，“系专伺往来大员过境，行暗杀主义”。（注）在1903年，已有革命党人在陕县联络会党准备起义。1908年9月，在省城开封的革命党人又重建同盟会组织，分头在新军和巡警中开展策反，

注：另据《汇报》1907年5月22日报导，李长胜等系哥老会头领，在直、豫、鄂三省均有分会，有“党羽”三万人。